

新儒学与新世纪

儒家思想的转型与展望

刘述先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人民出版社



NLIC 2970693247

新儒学与新世纪

儒家思想的转型与展望

刘述先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NLIC 29706932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思想的转型与展望/刘述先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202-04906-8

I. ①儒… II. ①刘… III. ①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1647 号

丛 书 名	新儒学与新世纪
书 名	儒家思想的转型与展望
著 者	刘述先

责任编辑	李剑霞 李成轩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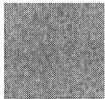
字 数	287 000
-----	---------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ISBN 978-7-202-04906-8/C · 123
-----	--------------------------------

定 价	34.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新儒学”在英文里有两个不同的用词，一个是“Neo-Confucianism”，主要指中国宋元明清时代以及同时期日本、韩国等地的“新儒学”；另一个是“New-Confucianism”，则是指20世纪以来的“新儒学”。就中国而言，宋元明清的“新儒学”，其“新”主要表现为在批判、排斥佛老的同时，广泛、深入地吸收了佛教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资源，对古典儒家的经典和思想作了新的诠释与发展，从而使儒学获得了适合近世社会文化的新的形态。20世纪以来的“新儒学”，其“新”主要表现为“吸取”但不是“批判、排斥”西方的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立足于儒学基本的价值立场，谋求使儒学获得现代的发展。现代的“新儒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丰硕的成果，但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如何充分消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因素而使自身在“未始出吾宗”的情况下获得“创造转化”与“综合创新”，正是现代新儒学的一个基本课题。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现代新儒学”往往被等同于所谓“海外新儒学”。事实上，所谓“海外新儒学”，其实本来根源于大陆，可以说，海外新儒学是儒学在特定历史时期在海外的开花和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儒学在中国大陆也得以重新发展。而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以来儒学的逐渐发展，既有“海



外新儒学”的影响，又是儒学传统自身在中国大陆“枯木逢春”之后自然抽发的“老树新枝”。“海外新儒学”固然不是铁板一块，大陆新儒学的发展也已成多元并进的面貌。不过，总体来说，在基本的价值关怀与立场方面，整个中文世界的“新儒学”之间是“所异不胜其同”的。至于在基本的价值立场与关怀之上发展出不同的思想形态和社会实践，在儒学传统中则是一贯如此，自然而然的。

儒学传统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于儒家学者的思考从来都不是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思辨。面对时代提出的种种课题，每一个时代的儒家学者总会提出自己的因应之道。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固然是既有“思想世界”又有“历史世界”，其“造论立说”与其“经世致用”相与表里，20世纪以来整个中文世界“成一家之言”的儒家学者，无论是侧重“究天人之际”而从事理论建构的哲学家，还是侧重“通古今之变”而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其实同样也都拥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这个意义上，儒学与时代始终是息息相关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新的世纪，总会产生出遵循孔子所谓“因革损益”之道而“与时俱进”的新的儒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新儒学与新世纪”丛书，反映了当代一些新的儒家学者对于新世纪中各种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可谓适逢其时。出版社盛情邀我作序，感其雅意，故略缀数语于上。

陈 来

2009年5月31日

自序

清华大学彭国翔教授是我的忘年交。他把我近年来发表的文章选编了一个集子，出简体字版以飨大陆读者，索序于余，自义不容辞。

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儒学总说”，有三篇文章。两篇讨论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儒家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世纪之交反思中华文化》其实是“中国亚太二十一学会”于1999年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记录，未敢掠美，志明出处，参与的学者对问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讨论。

第二部分：“儒家传统”，有五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我参加“理解、诠释与儒家传统”小型研讨会的发言，我指出儒家传统对于知识、价值与存在有整全的理解，和西方主流二元分裂的思路适成对比。第二篇文章是2005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返港，作第十八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的发言提要。接下来的一篇文章，我回溯先秦儒学的源头，《论孔子思想中隐涵的“天人合一”一贯之道》，指出曾子所谓忠恕之道，并不足以穷尽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含义。孔子既明言“下学而上达”，不可以遗落他对“天道”的体证。此文特色在我仅用《论语》所提供的材料就足以重构出隐涵在内的一条“天人合一”的思路，虽然这个词要迟到北宋张横渠才启用。2003年我应香港学海书楼之邀作八十周年纪念的专题演讲：《港台新儒家与经典诠释》。这篇长文校正了一般对港台新儒家的误解。打从熊十力先生开始，第二代新儒家的重镇唐君毅与



牟宗三先生以及其后学，绝非“以论代史”，莫不重视经典诠释，字字有根，而有通盘融贯的理解与体证。最后一篇短文《开展中的新新儒家》对这一思潮最新的动向作了简单的观察和报导。

第三部分“当代儒学”是我近年来作研究的一个重点所在。《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契机》是1994年底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作的一场主题演讲，由时代、方法、形上、践履四个角度来谈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契机。五年之后，于1999年在台北举行第十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会议，我著文《论当代新儒家的转型与展望》，重新由方法、形上、践履等视域，作出观察与展望。《从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学的历史处境与文化理想》是我应《汉学研究通讯》之邀，在2000年底发表的一篇特稿。清朝覆亡，制度的儒家画下句点。但精神的儒家由中心到边缘，仍展显了旺盛的生命力。新儒家被认为20世纪中国有活力的三大思想潮流之一，与西方自由主义、马列毛思互相激荡而前进，一时成为显学。识者肯认这一思潮立足本位，率先面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由1986年起，“现代新儒家思潮”成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之一，为期十年。2002年我发表《现代新儒学研究之省察》一文，结合海内外研究的成果，接受了广泛流行的一份十五人名单，并做出了一个“三代四群”的架构。我指出由20世纪20年代开始，每二十年为一波，四波的发展，始可以对这一思潮有一比较全面性的掌握与中肯的了解。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分论熊十力与业师方东美两个个案。2003年牟宗三全集由联经出版，我写了篇短文略谈其意义。最后一文谈了我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四位儒者——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学术上的渊源，作为纪念。

第四部分：“儒学与世界”。第一篇长文检视儒学的理想与实际，对近时东亚——包括日本与四小龙——发展之成就与限制有所反省。第二篇把儒学当做世界哲学，对于波士顿儒家——南乐山（Robert Neville）与白诗朗（John Berthrong）有所回应。下面的一篇文章，择要介绍了现代新儒学在英语世界的情况。最后一

篇文章，是我应韩国中国学会之邀于2006年8月作的一场基调演讲，对刚在北京出版的史威德勒（Leonard Swidler）的《全球对话的时代》的中文版作出回应。

第五部分：“儒学与宗教”。第一篇文章指出，宗教虽注目永恒，一样要面对现代化的问题。我由基督宗教的回应得到借镜，讨论儒家作为一个精神传统在今日的宗教意涵。第二篇文章是我应“现存哲学家图书馆”之邀，对杰出的伊斯兰哲学家纳塞（Seyyed Hossein Nasr）由新儒家的观点提出质疑与回应。我一方面看到双方的契合在“智的直觉”的肯认，另一方面新儒家主张吸纳近代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态度与纳塞彻底否定近代西方的意见可谓南辕北辙，而展开了剧烈的论辩。最后一文是最近写成的文章，意思是要作出努力，推动犹太教与新儒家进行对话。

附录是2004年中宗社为我所作的专访记录，以生动活泼的文字介绍了我近年来的关注。检视全书选辑的文章分量不一，有的是专论，有的是漫谈，读者可以各取所需。内容虽有些重复之处，但每篇文章由不同的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完全相同的论点，可以互补。由于我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2001年在台北出书，如今也出了简体字版，故国翔在本书中故意不选与这方面相关的文字。通过这两本书，当可以看到我在近年来努力的方向。

刘述先

2007年5月11日

目 录

一、儒学总说	(1)
(一) 儒家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1)
(二) 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7)
(三) 世纪之交反思中华文化	(14)
二、儒家传统	(40)
(一) 跨文化研究与诠释问题举隅：儒家传统对于 知识与价值的理解	(40)
(二) 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	(51)
(三) 论孔子思想中隐涵的“天人合一”一贯之道 ——一个当代新儒学的阐释	(55)
(四) 港台新儒家与经典诠释	(76)
(五) 开展中的新新儒家	(100)
三、当代儒学	(103)
(一) 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契机	(103)
(二) 论当代新儒家的转型与展望	(115)
(三) 从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学的历史处境与文 化理想	(128)
(四) 现代新儒学研究之省察	(147)
(五) 熊十力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理想	(159)
(六) 方东美的生命哲学与文化理想	(170)
(七) 牟宗三先生全集出版在今日的意义	(181)
(八) 中大儒者与我在学术上的渊源	(183)



四、儒学与世界	(197)
(一) 儒学的理想与实际：近时东亚发展之成就与 限制之反省	(197)
(二) 作为世界哲学的儒学：对于波士顿儒家的回 应	(219)
(三) 现代新儒学在英语世界	(237)
(四) 对于“全球对话的时代”的回应	(245)
五、儒学与宗教	(263)
(一) 由当代西方宗教思想现代化的角度论儒家传 统的宗教意涵	(263)
(二) 新儒家与新伊斯兰教	(281)
(三) 犹太教与新儒家	(300)
附录：	
世界和平与中道伦理的探讨——刘述先教授专访	(317)
世界和平与中道伦理的实践——刘述先教授专访 续篇	(325)

（一）儒家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近二百年来，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挫折，简直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直到 60 年代尾，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还认为，儒家将会是只有在博物院里面才找得到的东西^①。哪知由 70 年代开始，亚洲经济起飞。日本与所谓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它们都有儒家的背景，于是引起了对于儒家发生兴趣的热潮^②。而国内在“文革”以后也拨乱反正，“现代新儒学”竟成为了国家的重要研究项目^③。海内外都在努力探索儒家

① See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Vol. 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② 譬如 1993 年 6 月 14 日的《时代》杂志，封面是孔夫子，主题是“民主：亚洲找到它自己的方式”。文中引述了倡“历史终结”的日裔美人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说法。所谓东亚模式，以日本、新加坡为代表，都施行于儒家伦理发生过巨大影响的地区。

③ 1987 年 9 月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学术讨论会。研究计划由方克立与李锦全主持。“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15 册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从 1992 年到 1996 年相继出版。



传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①，有人甚至宣称 21 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但我个人宁愿采取比较审慎的看法。一方面我们不必像世纪初那样完全丧失民族的自信心，而且“全盘西化”之议毕竟不可行。然而，我们也别无选择，必须向西方学步。试看一百年来，我们已经向西方吸收了多少东西，而现在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化圈乃是一个不可侮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过分高估自己的实力，以致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下一个世纪真正是中国人的世纪，也得由别人来说，不是自吹自擂可以奏其功的。

事实是，由近代以来，一直是由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世变迄今，演变出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西方的霸权似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必须改弦更张的阶段。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与自省，使他们不只看到西方的盲点和缺陷，还看到其破坏与毁灭性的倾向。但未来世界并不会是另一文化——包括中华文化在内——取代西方的局面，必须要探索一种新思维的方式，才能够把握此中的关键。

现在世界似乎同时流行着两种表面上看来完全相反的潮流。一是离心的倾向：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盛行。在美国，黑人文化、印第安文化、西班牙裔（Hispanic）文化、亚裔（Asian）文化，各树一帜，互相争奇斗艳，拒绝再受主流白人文化的压抑，并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另一是向心的倾向：世界已演化成为一个地球村，如果大家找不到共识，觅得互相沟通、和平相处之道，就不免有互相冲突、战争、乃至全球性毁灭的危险。我们有必要由这一新的视域来考虑中华文化在 21 世纪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作出怎么样的贡献的展望。

在过去，由于交通不方便，不同文化分头发展。譬如基督教

^① See Tu Wei-ming, 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席卷西方，儒家则为东亚的母文化。无可讳言，传统儒家有强烈的一元化倾向，但排他性不强，有包容的倾向，故明末流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到了现代，既无法抵抗西方的坚甲利兵，于是把一切弊病都归咎于儒家。五四以后，先流行西化的思想，而后马列思想席卷中国大陆，儒家思想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少数新儒家学者流亡港、台、海外，华族陷于分崩离析的命运，于是引起唐君毅先生“花果飘零”的感叹^①，而余英时兄乃形容当代新儒家为“游魂”^②。正如他所说明的，这一词并无贬义，只是对于现象的描述。坦白说，我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描述的。儒家哲学作为一个精神传统是有活力的，但高远的理想难以落实，于是造成了当前的困境。其实想深一层，儒家并无须发展成为现实国家的主导意理，它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反而更容易突显出来。我们上一代的学者在1958年元旦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③，他们透显出一种深切的存亡断绝之情，故此一方面他们强调要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另一方面也突出道统的观念。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这一代所要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苏联解体，冷战时代结束。美国霸权也因韩战、越战而减弱。亚洲经济起飞，未来世界逐渐形成一个美、欧、亚三个中心的秩序：彼此不同，却又互相依赖，亟需彼此对话、沟通的局面。在这样的视域之下，十分清楚，儒家作为一个精神传统，只是世界上众多精神传统之一。在这一多元架构的预设之下，它并没有负担要证明自己优于其他传统，而只需要阐明自己的传统有其立足点与吸引

①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上册，第1~64页。

②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载杜维明主编：《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第28~34页。

③ 宣言由唐君毅先生起草，经讨论与修改后，由张君勱、牟宗三、徐复观几位先生签署，现收于唐著：《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的附录之中，第865~929页。



力，便已经很足够了^①。

当代新儒家的一个贡献在于，指出儒家所提供的决不只是一种俗世伦理而已。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由此可见，儒家也提供了一种“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内含一种“超越”的信息，但不同于基督教的“外在超越”的形态，而属于一种“内在超越”的形态^②。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世界，并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故为外在超越；天道流行世间，内在于人性之中，故为内在的超越。基督教强调信仰耶稣、他力救赎，儒家则强调修养工夫、为己之学。两方面确有不可调停者在，但此不足以为患。重要的是，两方面都肯定一超越的层面，也就有彼此会通的契机^③。近年来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也译汉斯·昆）因痛感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而提出世界伦理构想^④。令人惊异的是，孔汉思认为，宗教的通性并不在于信神，譬如佛教便是一无神的宗教，却没有一个宗教传统没有对于“人性”（humanum）的深切关怀。这样的说法与儒家的“仁”（humanity or human-heartedness）若合符节，我即撰文加以支持^⑤。1993年世界宗教会通过由孔汉思起草

① 譬如我以英文著儒家哲学一书，阐明儒家的精神性（Confucian spirituality），新近在美国出版，见 Shu-hsien Liu, *Understanding Confucian Philosophy: Classical and Sung-Ming* (Westport, Conn.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and Praeger Publishers, 1998)。

② 相关问题的讨论，参拙作：《论宗教的超越与内在》，《二十一世纪》总第50期（1998年12月号），第101~111页。

③ 基督教与儒家均源远流长，难以一概而论，不只新儒家一向强调与时推移，到了晚近，基督教神学家如赫桑（Charles Hartshorne）受到怀德海（Alfred N. Whitehead）的影响，倡“过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则彼此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很多，参拙作：《由当代西方宗教思想如何面对现代化问题的角度论儒家传统的宗教意涵》，《当代中国哲学论：问题篇》（新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年），第81~112页。

④ 孔汉思著、周艺译：《世界伦理构想》（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

⑤ See Shu-hsien Liu, "Reflections on World Peace through Peace among Religions: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22, No. 2 (June, 1995), pp. 193~213.

的《世界伦理宣言》，得到世界各大宗教以及代表人物签署^①。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立“世界伦理计划”（universal ethics project），三月尾在巴黎召开首次会议，邀请了孔汉思等十二位哲学家代表不同传统发言，我也应邀由儒家的观点略陈己见。我认为，面对世界的文化差异，取同略异的归纳不是办法，“理一分殊”应该可以提供一条出路^②。杜维明则在海外提倡“文化中国”的拓展，颇引起一些回响。由以上所言，可见儒家的精神性在当代仍有其活力，但它对东亚经济的奇迹并未作出贡献。不单如此，它对当前现实政治之未能真正体现民主的理念，所夹带的媚俗的倾向，以及一切向钱看的趋势，表示了深刻的忧虑，并加以强烈的批判。也就是说，在精神的儒家与政治化的儒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而后者恰正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者最感兴趣的东西。传统的典章制度的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固然已经死亡，但却留下所谓柔性的威权体制的文化与心习，这恰正是对于当前所谓东亚经济奇迹注意力集中之所在。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科技、工业革命的背景以外，有三个不可彼此分割的面向，即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民主政治（democratic polity）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③。现在东亚既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相对于这三方面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市场的强大力量是大家都可以承认的，但民主的问题就复杂得多。虽然大家在口头上都肯定民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在事实上，东亚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最重要的是，东亚经济的起飞往往与政府的指令密切相关，并不是一味的自由放任。而个人主义在东方则根本

① Hans Küng and Karl Josef Kuschel, ed., *A Global Ethic: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London: SCM Press, 1993).

② 参拙作：《世界伦理与文化差异》，《哲学杂志》（台北）第23期（1998年2月），第52~69页。

③ See Tu Wei-ming, 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44.



缺乏生长的土壤，倾向于西化的知识分子或者可以在观念上讲一套，但实际的作为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盲目追随西方，或者所谓的全盘西化，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真实的问题在于，如何令传统与现代作出有机的结合，各个地区都在找寻适合自己的道路。

儒家的因素的确是存在的。受到它感染的人民往往勤劳、节俭，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接受既定的礼仪，向往和平的秩序。但也附带着盲从权威、愚忠愚孝、讲究关系、做作虚伪一类的陋习。这些因素往往作用于无形之中，故此我常说传统的资源与限制一根而发，这些当然是社会学、人类学集中加以研究的对象。

政治化儒家与民间的儒家的结合往往在各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正好像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基督教发生了不同的作用一样，这里只举出新加坡与韩国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情况。新加坡华人占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立国以后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强势的政府领导与市场经济结合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领袖们的确反对西方式的完全自由放任，80年代一度曾经试图提倡儒家伦理。但新加坡是一个多族群社会，从未让儒家意理提升到国教的地位，最后终于放弃教授儒家伦理以及其他宗教知识课程的企图。到1991年政府发表《共同价值白皮书》(*White Paper for Shared Values*)，提出四项共识：社团高于自我；家庭为建造社会之基础；诉之于共识而非斗争之方式以谋求重要问题的解决；强调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宽容与和平^①。很明显，这些都是与儒家传统相容的价值。但新加坡这一城邦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方式，提倡清廉、有效率的政府，未必能够在其他地区加以复制。

韩国的情况就与新加坡完全不一样。韩国有自己的儒家传

^① See John Wang, "Promoting Confucianism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and Eddie C. Y. Kuo, "Confucianism as Political Discourse in Singapore: The Case of an Incomplete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in *ibid.*, pp. 277 ~ 309.

统。时至今日，自称为儒家信徒者虽不过百分之二，但就实际的行为来说，如孝亲、祭祖之类，佛教徒与儒家信徒完全没有分别，即基督教徒也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符合^①。由此可见，韩国在世界上可能是最为儒化的国家。在韩国民主建国的过程中，儒学者的贡献并不显著，他们虽质疑军方攫取政权之不义，但对于威权体制之作为一贯逆来顺受，采取合作的态度。然而韩国发展的大企业如“现代”之类，还是有浓厚的家族气息，与传统没法切断关系。而韩国经济近来发生问题，似乎也与官商勾结的传统脱离不了关系。

总之，东亚现代化的过程很明显地受到各地区文化的约制，儒家是一个非常相干的因素，既有相似的特性，也有不同的特征，难以一概而论。传统的威权体制以及人民的习惯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东亚与拉丁美洲、非洲比较，明显地占有了一定的优势。而落后地区要现代化，似乎向东亚学步，远易于向西方借镜，这构成了变形后的政治化的儒家在今日世界的巨大吸引力。当然这里面也决非不存在严重的问题，东亚许多国家虽有民主之名，毕竟法制未立，人权不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文化中国可以输出自己的方式，为有识的西方人士所吸纳，以对待其弊病。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西方的物质文化漫天盖地而来，则自己的优势也可以迅速流失，出现“礼失而求诸野”的现象。我们如何对传统和现代做出智慧的抉择，仍是世纪之交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二）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1. 引语：西方中心直线进步观的破产

由全世界的趋势发展来讲，西方世界从启蒙时代以来单线的进化观，可以说是被彻底地推翻。原有的文化要往前走的话，先

^① See Koh Byong-ik,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Korea," in *ibid.*, pp. 191 ~ 201.